长篇小说：攀登，没有止境

□丁晓平

如何表现或再现中华民族苦难的历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尤其是军事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来说，或许是受众对它的期待太高，或许是读者对于文学爱得太深，人们在焦虑、忧患、叹息和观望中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诸多评论以此与俄罗斯文学相比对，中国文学确实至今还没有出现一部与我们民族的苦难史相匹配的优秀作品。面对这样的尴尬和无奈，中国作家以不抛弃不放弃的执著，继续在文学的高原上向高峰攀登。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年份，自然离不开关于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话题。当然文学创作必须尊重创作规律，它不是赶集，也不是应景。在这样的日子里，文学不能缺席，作家不能失语。纵观2015年有关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无论是创作的视野还是艺术的探索，作家和作品都作了有益的拓展。

在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军旅作家黄国荣的长篇小说《极地天使》（作家出版社）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这部作品还原了1942年侵华日军在山东潍县乐道院制造的恐怖事件。在这个由日本侵略者设立的亚洲最大的“敌国人民生活所”里，关押了大量在华欧美侨民。小说以一位美丽的白衣天使苗雨欣舍身与恶魔共舞、在乐道院里暗中发起一场大营救为主线，围绕集中营侨民组织建立自救会，取得与集中营外中国朋友和游击队的联系，里应外合地与日军在恢复教堂、恢复学校、保护儿童妇女、反饥饿、抗迫害、反清剿等事件中，与日军针锋相对地展开了一系列斗争，汇成了一曲波澜壮阔的同盟国进行曲，从而使读者走进了那个鲜为人知的侨民集中营阴森恐怖的氛围之中，并随着小说中人物命运波折跌宕而惊心动魄。《极地天使》根植历史的真实，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把中国人民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机结合一体，是一部视角独特、视野开阔，人物个性鲜明、形象丰满多彩，又不乏冷静、客观、幽默等文学意味的佳作。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学作品总是令国人心痛滴血。余之言的《战争画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小说的形式，再次撕开民族至今依然阵阵发痛的疮疤，在血污与沦丧的洗礼中，在痛楚与苦难的咀嚼中，不仅让人进一步看清日本侵略者的丑恶与罪行，更引领读者走进民族本应具有的性格与精神的世界，去认识被泼满战争血污却又决绝抗争的伟大人格，实现了作家对这一题材的文学超越。作品以《玉娘哺》《凌波仙子》《呼啸的生命》等23幅出自小说人物之手的画作作为章目结构的方式，匠心独具地构成了小说的总体叙事框架；而且随着每一幅作品依次进入读者的视线，不仅实现了情节、人物、故事和内容的无缝衔接，而且作品的主题、情感和思想也随之深化和丰富，将读者带入文学营造的历史氛围之中，从而透过血迹斑斑的“战争画廊”，再现了民族苦难的精神历程，证实了中华民族忍辱含耻却又高贵坚韧的性格特征。

除了以抗战历史事件为创作素材之外，抗战历史人物也是作家始终关注的方向。军旅女作家王霞历经十多年，奔赴东北、山东、湖北、广东、陕西多地采访东北军有关人员及其后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打回老家去》（中国书籍出版社），就是讲述东北军第57军111师中将师长常恩多率部转战苏皖鲁，杀敌锄奸、团结抗日，1942年在鲁南率部起义参加八路军，实现了东北军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故事。小说真实再现了包括常恩多、王振乾、郭维城、张苏平、王再天、王肇治、刘祖荫、孙立基等一大批真实的抗日英雄，通过丰满而生动的战斗图景的描写和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设置，再现了70年前腥风血雨的战争岁月。陕西作家崔正来以历史人物傅作义为原型创作的120万字的长篇小说《傅作义》（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傅作义出生写到离世，展示了这位历史人物的成长经历、战斗生涯、人生难题、重大抉择和内心波澜，受到文学界的关注。

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是一座值得挖掘的富矿。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从作家萧红的短篇小说《旷野的呼喊》中一匹“身上烙有日本军营的圆形火印”的战马身上得到启发，创作了长篇小说《火印》（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火印》以抗日战争时期的北方草原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男孩和一匹战马的传奇经历，构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不同于一般抗战题材作品，曹文轩拒绝了脸谱化、漫画化、公式化的倾向，注重从人性的角度对裹挟进战争中的中国人、日本人进行思考和审视，发人深省。曹文轩一直坚持故事构建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读者从《火印》中可以充分领略他的别具匠心。诚如作家所言：“《火印》选择的路数是写战争，但更在意写战争中的人。雪儿是一匹马，但它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人，是有着人格的马，有尊严，有智慧，有悲悯。即使作为动物，它也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动物。我写它，只是在战争中写它。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它的出现也许是天意。因为我在构思这本书时并没有将它与这个日子联系起来。我很在意这个日子，但这部作品却不是刻意为这个日子而写的。所以这是天意”。

战争文学核心的主题是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就是写出人的血性。血性就是责任、荣誉和担当。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史雷的《将军胡同》。这部荣获“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最高奖的儿童题材战争文学作品，作者以从容不迫的语言娓娓道出老北京传统文化的精髓与意趣，写出了国家危亡之际，以主人公八旗后代“图将军”为主的“平民英雄”的灵魂觉醒和精神成长故事。作为一部抗日题材的儿童小说，《将军胡同》没有空洞的口号和说教，也没有过分拔高任何一个人物，甚至不写战火硝烟，但在作者沉郁平静的叙述中，“图将军”从生到死的人生命运，慷慨悲歌，催人泪下，让人看到对侵略战争的控诉、对民族精神和文化传承的思索，以及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希望。作品叙事风格朴实庄重，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每一章的内容既可独立成篇，串联起来又是一个背景完整、人物形象丰满的故事，显示了作者优秀的结构能力和扎实的叙事功力。

不可否认，面对现实，军队作家和军旅文学在较长的时间里处于一种莫名的困惑与焦灼之中，已经是不争的现实。笔者十分赞同著名评论家汪守德的观点：“作家普遍感到信心不足，不是羞羞答答、止步不前，就是无力问津、退避三舍，表现出不应有的却是可以理解的畏葸与胆怯。”值得一提的是陶纯的新作《一座营盘》(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品直面当下军营生活发生的问题，生动形象地刻画出当代军营中的真实人物，以犀利的批判精神激浊扬清，为重塑军魂贡献了一份心血。作家周大新着力表现地方题材的《曲终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样为反腐倡廉题材的创作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

正因此，以能打胜仗为主题的长篇小说《陆军一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就显得更接部队战斗生活的地气。作家郑方南的这部以实战化训练为题材的作品，沿袭其由电视剧本改写成长篇小说《蓝军出击》的创作模式，描写了陆军航空兵部队基层指挥员姜海、郭胜洋、左同军等一大批有思想、有担当、有血性的当代青年军人形象。而青年作家王凯和王伏焱原生态式摹写军队基层生活的长篇小说《瀚海》（《当代》2015年第6期）和《从这里到永远》（白山出版社），字里行间都浸透军旅生活的原汁原味，不矫饰，不策略抒情，对军旅青春的描摹生猛而又彻底。王凯的《瀚海》回归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巴丹吉林沙漠某空军基地，讲述了叶春风等六名军校毕业生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余年在艰苦环境中的人生选择和人生走向，写下了新一代基层军官的血性青春心灵史。这部直面强军实践的现实主义作品，没有回避强军路上的困惑、矛盾和冲突，凸显了青年军人的底气、士气、霸气和英雄气。王伏焱则通过《从这里到永远》勇敢地建构了“像”的部队，其鲜活而富于时代感的人物形象，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简洁优美而又生动幽默的语言，构成了小说坚实丰富而又宽大厚实的两翼，从头至尾漫溢着动人的“真实”。另外，坚守航天题材创作的赵雁在完成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飞天梦》之后推出了长篇小说《第四级火箭》（作家出版社），以独有的女性视角，塑造了从将军到科研人员以及普通士兵、工人的形象，全景式再现了中国航天人半个世纪以来默默无闻的奉献、创造和追求，丰富了军事文学在军事科技领域的人文表达。

总之，2015年的军事长篇小说创作有收获，也有遗憾，尤其是现实题材的创作依然任重道远。而在“强军目标”的指引下，如何表现人民军队最为恢弘的结构性的革命性改革、如何描摹世界新军事变革下的实战化训练、如何再现当下革命军人的战斗精神和生存状态，都需要军旅作家和军事文学作出响亮的回答。文学是一座高峰，攀登没有止境。面对军队崭新的现实和美好的未来，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充满希望。

阎肃的『成功法宝』

□陈鲁民

每年，总有一些渴望事业成功的年轻人写信给空政文工团的著名词作家阎肃请教：“您是怎么成功的，有什么秘诀？”被誉为“艺坛常青树”的阎肃，通常回答只有简简单单8个字：“天分、勤奋、缘分、本分——天分就是你必须是干这件事情的料，勤奋就是所有成功的人都是勤奋的人，缘分就是把握好机会，本分就是要给自己正确定位。”而他尤其看重的是“勤奋”。

妻子李文辉说：“老阎的驼背就是他勤奋的证明。我看过他中学时的照片，身板挺直的。30岁前，老阎连一个休息日都没有，常常是一杯茶、一支烟，一本书看一天。”儿子阎宇说：“如果非要说最平凡不过的老阎同志有什么不平凡的，我觉得就是他比别人更勤奋。老爷子是个非常喜欢学习的人，读书看报看新闻就像吃饭一样每天不可少。我有时半夜12点醒来，他在那里看书；有时都两三点了，他仍在那里写东西。”从风华正茂到耄耋之年，阎肃从来没有在凌晨一点半前睡过觉，不是读书，就是创作，几十年如一日，甘之如饴，乐此不疲。对此，阎肃嘿嘿一笑，说：“我发现，半夜常常是灵光乍现、出好词的时候，我的好作品大都是‘夜半歌声’。有时候睡下了又突然醒来，有灵感了，就摸黑拿出一张纸，写下几句词，可第二天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写的字”。

阎肃的勤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读书勤奋，他的座右铭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家里有多达万余册藏书，从唐诗宋词到武侠小说，从专业剧本到社科读物，每有闲暇，便手不释卷，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出差在外，也不忘读书，读书成了他的第一乐趣。二是深入实践勤奋。数十年来，阎肃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几乎走遍了空军部队，或体验生活，或搜集创作素材，或为官兵讲课辅导，培养文艺骨干，既服务了部队，也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了不竭源泉。三是创作勤奋，从艺60多年来，他几乎每月都有新歌问世，每天都有佳句诞生，而且是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看见什么，就写什么。就这样，他创作了《江姐》《我爱祖国的蓝天》《军营男子汉》《长城长》《敢问路在何方》等1000多部（首）作品，无不脍炙人口，到处传唱，有的已成经典曲目，久唱不衰。

阎肃的成功经历，再次验证了古往今来无数成功者的共同经验：勤奋就是敲开成功之门最有用的敲门砖。

一般来说，勤奋对成功的最大帮助有两条。一是勤能补拙。即使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如果能几十年坚持不懈地勤奋工作、勤奋钻研，日积月累，水滴石穿，也能取得不平凡的成就，能敲开成功的大门。阎肃如此，莫言如此，袁隆平如此，屠呦呦也如此。二是勤能补时。成功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时间不够，人生苦短，还没有来得及干出什么名堂，就已经垂垂老矣。我们观察每一个成功者，都会发现，他们都是在八小时之外投入大量业余时间在工作，而按部就班少有加班加点记录的人，往往与成功者绝缘。无疑，时间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勤奋能补充时间的不足，为成功创造必要条件。

天道酬勤。靠着勤奋，阎肃成了全国著名词作家，创作了大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我们每一个渴望事业成功者，不妨看看阎肃老师的前进轨迹，学学他的勤奋精神，自强不息，奋发有为，也走出自己的人生辉煌。

诗歌：仍留一箭定天山

□王凤英

刚刚过去的2015年，诗坛呈现出的热闹景象是少有的，无论是社会对诗歌的关注度、对诗人的热议，抑或作品总产量和题材的宽度，都有了不凡表现，诗艺也有一定的突破。这便形成一种印象，似乎诗歌边缘化和非诗歌时代的质疑已经远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诗歌的狂热被组装和复制，诗歌再次成为人们的精神需要，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如何这多少令人暂且欣慰。基于广大官兵的心灵市场和精神需求，身披铠甲的军事题材诗歌从来不会寂寞，一无例外地和非军旅诗人们的歌喉保持了应有的密切关联度，并在文化诗意的阵地上反思战争、回顾历史，寻找属于军人的精神脉动。

题材的优势与诗人群体的参与

反映时代主脉不仅仅是军旅诗人的责任，亦为当下诗人所负重轭。2015年大事频仍、题材多元，给了诗人观照当下走出“小我”而与时代精神内核结合起来的宽度与广度。与此相对应的，全国文学刊物包括报纸及新媒体在内，其中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主题的栏目与版面策划纷现，声浪几近覆盖诗界，尤其是《诗刊》于7月（上半月）推出专号，集合马识途、柳荫、朱增泉、刘立云、商震、雷平阳、汤养宗、李轻松、路也、大解、胡弦、娜夜、姜念光、聂权等一批当下诗歌一线的新老诗人，不分军内军外，用诗歌抒写70年前发生的那场用鲜血和生命浇铸的胜利。这些诗歌不只是一种对当年血雨腥风岁月的情绪宣泄，更多是充满痛感的深度反思，特别是对照当前日本军国主义裸露的似曾相识的狂妄野心，诗人们难抑的或激愤或担忧或冷嘲在创作中持续澎湃着，不断地从一种身份转换到另一种身份。如马识途写于70年前但从未发表的组诗《榴花开得火样鲜明》，就是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发出的坚实的声音，是对身在历史中种种场景的独特情感表达，其中《我们结婚了》（1939年10月）一节中最为典型，他选取“主婚的人”是“爱情”、“证婚人”是“艰辛”、“介绍人”是“革命”、“客人”是“在屋檐上跳着的小麻雀”，虽则直白，那个革命年代的特别婚姻的情感却格外真切、感人；同样写于战火中的《比血更贵重的》是柳荫的组诗，他用“谣歌”“热血，滴滴”“风暴间隙的宁静”“一同唱出对祖国的爱……”等短章，写下独属于战地生活的偶忆，时常由衷感到“山村的气息，如同骤雨后的一条小溪”，诗人的爱浓烈且真实地呈现其持续性。与之身在历史中奔涌的情感体验所不同的是，马新朝的《铁色素》和雷平阳的《我流了几吨血》则不乏理性的思考与反省，前者在遥想多年前的敌情紧急，绝不可能不对当下局势作本能的关注：“那几个日本兵并未远去/他们在那个夏日杀人放火后/又潜入到今天”，以及“温习着这些口令/努力把自己从生活的烂泥中拔出来”，诗人的挣扎和忧虑源于想要国家和民族有“安放神圣和尊严的地方”；后者对战争的思考更为冷静，他同一个出席自己葬礼的老人一起目睹葬礼上的种种情景，悲凉、孤独、死亡的恐怖等极端情绪被淡化处理了，这是因为他感到他的声音孤独、冰凉“像70年前射出，但至今没有落地的子弹”。而刘立云气势磅礴的组诗《紫荆关》令人感到涨潮时的惊涛骇浪，作品中狂放的节奏不过是诗人内心难以抑制的冲击波，一气呵成的《听某老将军说八年抗战》一诗，情甚切切。其他如简明的《在太行山上》、李轻松的《十万义士》、姜念光的《埋伏》、汤养宗的《当年留下的子弹》以及大解的短诗《英雄》、路也的长诗《随园》等，强烈的情感加上有意识地遵循一种热情表达的目的，试图坚持抵达看似哀而不伤的境界似乎不那么容易，结合着诗人有意识追求诗性的需要而使这一类的诗歌在写作上逃离咆哮的破坏力量。马新朝等诗人的诗歌在重新提醒着人们驾驭军事题材诗歌中的大词放置的位置和呈现的面目十分重要，情感拿捏稍逊一筹便会流入难以把握的轨迹而游离诗人发言的部位和初衷，警惕豪迈气概被无意识弱化。

与地方报刊相比，《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西南军事文学》《西北军事文学》《神剑》《前卫文学》《橄榄绿》等军内报刊专门开辟的阵地进行连续性刊载，打破军内军外诗人身份的藩篱而共同行进于纪念性主题写作中，如商震、牛庆国、罗长江、胡卫民、广子、张庆岭、王方方、李林芳等诗人。无论是多元题材的充盈性上还是诗人的参与度上，明显要好许多，为数不少的军旅作家、评论家也纷纷参与到诗歌尝试性的创作中来，十分明显的是他们作品数量虽不算多，但拓宽了发声的坚固渠道，如朱秀海、汪守德等，多用格律诗旧制记取怀古抒今，如《嘉峪关怀古》（8首）、《园殇》（14首）。一直用格律诗抒怀发声的还有李文朝、雷海基、刘庆霖、王琳等诗人，他们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他们的《血肉筑长城》《天军吟》《哨兵》《浣溪沙·响堂铺抗日战场巡礼》等诗作，“说豪情，多少英雄不死”的理想和“万里空天任我行”的豪迈，在植入战争背景之中的旧体诗，不再延续精致的纯诗写作，这里没有繁复的意象和混乱的呐喊，只有对家国情怀的强者高歌和对死难将士的咏吟。而刘立云、姜念光、曹宇翔、刘笑伟、马萧萧、康桥、张国领、杨卫东、堆雪、杨献平、周东浩、胡松夏、温青、吕政保等军旅诗人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一本年度公共题材的创作上体现了高度一致性，其中刘立云的《长城：金山岭》这首长诗有浓厚的民族感情、严谨的结构、恢弘广博的内容，在歌颂戚继光等古代著名的马背上的将军的沙场建功立业，影射当前军中大老虎的贪腐给军队带来战斗力丧失的危险，面对觊觎我领土的“倭寇”，“子孙们将沦为鱼鳖”的可能性，作者是愤怒的，忧心的，这便使这首诗上升至与有关祖国及人类命运的层面，将热烈激越的诗情与严肃危急的民族情绪结合起来，通过诗人意识的产生和成长，来“显示人类起源到现今的缩影”（奥迪赛乌斯·埃利蒂斯语）。

另外，对当下军营生活、训练、边地环境和当代军人个体形象、品格的关注以及英雄等题材并未缺席，在2015年仍然成为创作常态。如康桥的《燃烧的歌唱》、胡卫民的《表情》、堆雪的《昆仑诗行》（组诗）、温青的《喀喇昆仑的鹰》、周承强的《远山如梦》（组诗）等。

事实上，诗歌这些阅读热与关注度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即微信的普及，诗歌重回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你读诗”、“诗歌是一束光”、“第一朗读者”、“读首诗再睡觉”及“猫头鹰阅读”、“诗刊社”等公共微信号订户动辄十几至几十万，可以想见，每天有庞大的微信订户定时在阅读诗歌，诗歌活动的骤增，带来的是诗人的消息和诗歌活动信息刷满各种微信圈。另外，“中国诗歌网”推出的“每日好诗”，使得网络平台推波助澜的威力令人印象深刻。

诗艺的突破与诗意解构的记取

诗人承担着衡量、检查、质疑的主要作用。而诗歌成为与时间、变形原则抗衡的决定性力量，诗人在一定社会表面的沉默和开放社会碎片化的信息洪水中成为发言人。这就等于说，诗人如果不能在诗艺上突破和关切，缺少诗意地解构文字的能力，在如此沉重而严肃的“使命感”及公共话题的重轭下，必会始终处于剑拔弩张或如同打了鸡血一样的紧张状态中，诗歌成了呼喊和哮喘，诗行中充斥鼓点和号角，艺术粗糙而情感空自浓烈，谈不上有什么整体的精神力量和艺术高度。那种简单而缺乏取舍的蜂拥而上的所谓现象“真实”和手法“现代”的说辞，不过是为其艺术思想力的羸弱而进行的苍白辩护。

因此，盘点过去一年的军事题材诗歌作品会发现，军旅诗人已经有意识地调整和学习驾驭人类永恒的诗语，并形成个人的大的印记，对途经生命中的一切都有审视的关联。这种对于军营情感和生命经历的有效写作姿态，使诗歌的纹理清晰不少，不乏佳作。姜念光的《埋伏》（组诗）通过对战争年代背景下的特殊场景推动及军人青春诗意的扫描，以可靠的细节、朴素的表达，使他的诗获得了较好的感动能力。其中，《山东庄稼汉》是对疼痛和苦难的再次呈现，疼痛在隐忍，苦难在加剧，可贵的是他没有让这种情绪泛滥成灾而比较好地进行了节制，如写被敌人蹂躏下的中国土地，他用“鬼子用新修的一条路/勒死了这片土地的呼吸”，而人民生活则是“天上孤悬的那轮残月/像一盏提心吊胆的灯”，诗歌美学意义上的宽阔诗性有了一些恰到好处的控制力。同样，另一首《美学课》短章的音乐性、技术化使诗意得以扩展。广子的《祭南岳忠烈祠》一诗打破了他步入中年以后的温和语气和稳健的叙述，粗鲁与尖锐重新回归，自反的生命理念非常清晰地契合了这首诗所想表达的情绪与立场，连续发问15个“……是一个词吗”后突然瞪大双眼更加大声发问“如果你一定逼着死人说话/烈士你说，死都死了/为什么骨头化成灰站起来/走那么久，那么多冤枉路/——回来/你说，回来是一个词吗”，其强势的嚣张及绝望的真诚几令人崩溃，而这正是诗人执拗的锋利所在。这首诗有一种稳定的结构形式，保持了他的诗歌特有的骨骼和硬度，而其中显著的炫目技艺令人叹服，这是诗人表达上的彻底。杨卫东的《将军，视野之上的头颅》延续了诗人一贯的诗歌风格与诗意解构方式，仍然努力在场阈空间灌注他个人生命的元气和基本旨趣，可以看出诗歌有意识地对生命意义作探究的用心。杨献平的诗体现了诗人与诗评家之间的特殊性与一定的关联，他一向追求内向性的表达，淡化功利性，无论是个人情感的向度还是对日常历史化的精神安妥感，都体现了诗歌特有的势能和个人表达的存在感。堆雪的《昆仑诗行》（组诗）大体属于主情范畴的类型，抒情主体的位置比较显豁，诗歌的表现性、抒情性与呈现性、具象化在一些短章中能够达至平衡关系，像“把一座山从积雪中扶起来”与对雪山要“用大把大把阳光和北风的草料喂养它”这样的诗性表现力，可以看出诗人有自觉诗学抱负的努力。胡松夏的《山河》以烈火金刚般的情怀、高山大河般的意象潜入故事内核，富于惯有的英雄主义气质。

语言的安顿与美学的在场

约瑟夫·布罗茨基认为，最终极端的力量是“当语言终于不再满足于上帝、人、现实、罪孽、死亡、无穷、拯救……而达到饥不择食的状态”。而庞德说艾略特有句话很好，“对于想把诗写好的人，没有一种诗是自由的”。在创作重大题材的诗歌作品时，首先要想到的是经历者的感受，而非再有语言的“表演”，试图用句子之间的修辞缠绕达至碰撞效果都是徒劳的，须用真实的真切的感受进入诗歌的层面。军事题材诗歌并非一定是咆哮式或呐喊式才算是有了激情，不是有了这些就能写得出好诗。在一个特定的题材面前，仅仅用分行文字来传达某种情感是不够的，其中掺杂的口号式的语言和非诗的因素实际上与诗歌的标准相去甚远，话多诗少，直白就会浅显易懂。

（下转第8版）

军事文学 2015年度综述